

* 文哲譯粹 *

鍾伯敬《詩經鍾評》及其相關問題

村山吉廣著* 林慶彰譯**

詩妖鍾惺

鍾惺在清初的學者間是聲名不佳的人，顧炎武的《日知錄》卷十八之〈鍾惺〉條，舉出三點缺失，其一是任福建提學副使時「大通關節」的事。這是指今日的「不正入試」之類。其二是得知父親的訃告，仍挾姬妾出遊武夷山，然後才上路。其三，在家時，選歷代詩作《詩歸》，這書風行，接著刊行《左傳》、《史記》、《毛詩》的評。顧氏批評其「好行小慧，自立新說」。關於鍾惺所為，顧氏在說「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的話後，又有如下的話：

舉業至於抄佛書，講學至於會男女，考試至於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中略）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卷十八〈改書〉條也可見到對鍾惺之批判。這是討論《詩歸》上的「妄誕」，指摘《詩歸》所收的詩，任意更改字句，而說「此皆不考古而肆意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顧炎武對鍾惺批評之是非，不在這裡討論。鍾惺的工作可說是明末人風氣的表示。一方面，顧氏口氣鮮明的表示了唾棄那種風氣，倡導樸實之學的清初學者的精神，是意義深遠的。

* 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日本《詩經》學會會長，《詩經研究》主編。

** 本處研究員。

在清人對鍾惺的批評中，第一個是錢謙益。錢謙益在《列朝詩集》的小傳，批評《古今詩歸》的盛行說：「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而後又說：「而寡陋無稽，錯繆疊出，稍知古學者，咸能挾筴以攻其短。《詩歸》出，鍾、譚底蘊畢露，溝澮之盈，於是乎涸然無餘地矣。」還有，接著批判的一節是極富文學性的。

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

大要以鍾氏是「不學」、「僻見」，最後把它稱為「詩妖」。

《四庫提要》作者的論法，和前者如出一轍。例如在《提要》經部詩類存目一，收錄鍾惺所撰《詩經圖史合考》二十卷、《毛詩解》二書。關於前者，說「於經義一字無關，全書所載，類皆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關於後者，評說「謬陋殆難言狀」。^①其他部所收《詩歸》以下的各書，所說的大抵相同，但批判更涉及鍾氏的流派。再舉一例，詩類存目一所收明萬時華所撰《詩經偶箋》說：「況以竟陵之門徑，掉弄筆墨，以一知半解，訓詁古經。（中略）蓋鍾惺、譚元春詩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極，乃至以其法解經，《詩歸》之貽害於學者，可謂酷矣。」同樣，對章調鼎選的《詩經備考》，也表示了嚴厲的排斥反應，該書說：「是編因鍾惺未成之本增損成書，以攻擊朱子《集傳》。夫《集傳》排斥毛、鄭，固未必盡無遺議，先儒亦互有異同，然非鍾惺等所可置議也，況又拾惺之餘緒者乎！」

但是，這樣受到眾人批評的主著《詩歸》的盛行，鍾惺、譚元春的詩派，在明末作為竟陵派是畫時代的事，也是大家所周知的。《明史·文苑傳》說「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試著給予竟陵派史的位置的論文，是入矢義高早年所作的〈關於詩歸〉（《東方學報》（京都）第十冊，昭和二三年九月）和〈從公安到竟陵——以袁小修為中心〉（同上，第二五冊，昭和二九年十月）。入矢氏對於竟陵派崛起是在矯公安派之弊的這種通說，他以為竟陵派興起的意義不僅僅這一點，他們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摧破王李一派的門戶，有關《詩歸》成書的事情、鍾惺詩評的特質等，

^① 《詩經圖史合考》，未見。《毛詩》，在前面加「古名儒」，由鍾惺編纂，收歷代詩解十五部，卷末有鍾惺編「新刻逸詩」。筆者所見者為內閣文庫藏明刊十冊本。

儘量去討論。特別關於他們的詩評，他說：「鍾、譚二氏的詩人，或是爲文學批評家的人間性，他們所要標榜的是發揮特異的獨自性。」

這裡有稱鍾惺選的《詩經鍾評》一書。筆者所見的是內閣文庫所藏，有杞堂藏版，明泰昌元年序刊的三冊本。這書在卷首除載〈詩論〉一篇外，和《詩歸》同樣地，它的特色是在詩的本文施加圈評。不過，鍾惺之書僞撰的很多，關於《詩歸》，《明詩綜》也加以懷疑，《詩經鍾評》的來歷，是否確實，很難遽下判斷。但是，從先前所舉《日知錄》所說「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當時，關於《詩經》，用鍾惺之名的書大爲流行，是可理解的。^②因此，如果這書比較接近那些書的話，根據這點，我想這書可以把它當作鍾惺，乃至竟陵一派，對《詩經》試著作什麼傾向解釋的一種線索。

鍾惺的〈詩論〉

《詩經鍾評》卷一載有《詩論》一篇。這一篇除收入鍾惺的《隱秀軒文集》的列集論一外，明林德謀的《古今議論參》（有崇禎七年序刊本），其他也有採錄（《古今議論參》所收者省略後半部不載），是鍾惺比較爲人所知的文章。

這篇論說的開頭，鍾惺說詩是活物。依據他的說法，從漢到宋，有很多學者解釋過《詩經》，但那些並非得當之言。但是，那並非他們的過錯，是詩的本質讓他們如此。《詩經》所以稱爲經典，是容許斷章取義的；依說詩者之意而出現各式各樣的解釋，也是「自如」的。在這裡，才有作爲活物的真面目。

因此，詩的「指歸」不是漢儒之說，也不是宋儒之說，也不是第三者獨自的說法。如果認爲定於其中的那一個，那是「隘且固」的態度。這裡是對這時代學者的所謂新古之爭的批判。

還有，〈詩論〉中的記述，鍾惺對朱子排除小序的立場，稍有袒護是可以察知

②「評左傳」是指《鍾評左傳》，有汲古閣刊本。「評史記」是指《史懷》十七卷。「評毛詩」之書，除《詩經鍾評》之外，筆者所見者有《鍾伯敬先生評點詩經》明刊二冊本（內閣文庫藏），但這書不載〈詩論〉，圈評也簡略。後面提到姚際恆的《好古堂書目》，有《批評詩經》，明鍾惺硃評五本。因《詩經鍾評》不是硃評，冊數也有異，和想和姚氏的所藏本不一定一致。《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經部，可見到《詩經評不分卷》，明閔氏刊朱墨套印本。本書編者所見者好像和姚氏所藏本相類。

的。但是，他批評朱子的「近滯、近癡、近疎、近累、近迂」，鍾惺對朱子的不滿，也是應該的。

關於朱子的注，有如下的說法。即朱子的本意恐怕也不是把自己的注作為最終的定論，還有「最下者」是僅分其意向，明其訓詁，後來的聰明之士，把這作為其基礎而施加解釋。結論的末尾一節有如下的說法：

乃欲使宋之不異於漢，漢之不異於游、夏。游、夏之說詩，不異於作詩者，不幾刻舟而守株乎？故說詩者散為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一，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為經也！

大體來說，詩的解釋並不是固定的，他在〈詩歸序〉以詩的本質在「精神」，能把握它的精神的話，從那產生無限的變化，期盼得到更高的發展的立場是一樣的。入矢氏引袁宏道「人不可無癖」的話，這種「個性至上主義」的志向是明末整個時代的風尚，鍾氏詩論的歸趨從這裡也可略知一二。

在《古今議論參》鍾惺的〈詩論〉後，把東坡的詩論加以參照：

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曲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夫詩上及于君臣父子、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微。蓋其中無所不具，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

詩基於人情的論點是歐陽修的說法，蘇東坡承繼這個而展開其議論。《議論參》的編者在這裡編入這段文字，可看出鍾氏持論是它的延續。

當然，鍾氏不是用人情的話來說，但在詩解的自由和無限性，和《詩經》的詩的本質，有和歐蘇類似的認識。或者，他更換用語的話，我想，他認為《詩經》的詩也和一般的詩有同樣的「精神」、「性命」（但這個詞在這裡不被用）的發露。

在《經學文衡》中，載有下面東涯的按語：

古書說詩，不拘本義，融取活意。觀《孟子》、《禮記》、《左氏傳》所引，可見矣。且如「敬止」之「止」，本只助辭，《大學》引以為「止至善」之證，

使後世人爲之，必墮謬解，他可準知也。

東涯把鍾氏詩解不可固定化的說法，用「融取活義」來表現。後段的「敬止之止」是助辭的話，是說朱子玩味詩旨，拘泥字義，是對朱子一流的附會作批判，和鍾氏當面的議論不太有關。《經學文衡》所以收鍾惺的〈詩論〉，依照東涯的按語，仁齋曾將丘濬的〈詩論〉和鍾氏的〈詩論〉合併，末附自著的〈詩論〉一冊，可說有其企圖。仁齋對鍾氏討論的共鳴是，鍾氏以詩爲活物，掃除拘泥於訓詁之末，主張詩解的自由，而不依朱子注的權威。^③對鍾氏來說，可說是知己的出現。

「鍾評」以後

先前所說《詩經鍾評》形式上的特色，第一是在詩的本文施加批點和圈點。

在文章上加圈批的例子是《文章軌範》等著名的書，但在經書中加上那個是《蘇批孟子》已先有之。形式上的第二特色是在詩句上加評語。這兩點，和讓鍾氏之名高揚的《詩歸》的形式相同，是不用說的。

關於評詩法的由來，入矢氏有如下的說法：

這樣的評詩法並不是他們所創始，據我所知，最早的是南宋的劉辰翁，在王荊公集施加評點。和這相類似的，在這之外還有吧！還有，要把這合併考慮的，是和制藝即時文的關連。即八股文文格完成的明代，特別是李夢陽、王世貞、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諸家，爲了把古文法應用到時文上，頻頻說古文的意義。作爲那種方法，把古文加上種種的評點。像歸有光的《史記評點》就是如此。（〈關於「詩歸」〉）

又，入矢氏以爲《詩歸》的評點，是「有感於禪家語錄和評唱相通的性質之物」。無論如何，這種評語是明季的風尚，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在《詩經》加圈批是《詩經鍾評》爲最先。現在，將批點、圈點暫擱一邊，舉評語具體的例子二三個來看。還

^③《古今議論參》、《經學文衡》收有〈詩論〉的事，由土田健次郎提示，仁齋學和鍾惺〈詩論〉的關係，參照《詩經研究》所載土田論文。

有在評語中，附加於句子旁邊的短句很多，在欄外的，稍長的文章可常常看到。

〈芘苜〉詩的欄外有如下的評語：

此篇作者不添一事，讀者不添一言而得之。

〈汝墳〉詩各章末四字有圈點，在頭注說：

四字深情，後人之閨怨詩，不出此四字。

〈東山〉詩的欄外注有如下的話：

既曰歸矣，又心悲，何也，可思可思。亦字有望外之意。(一章)

曰歸者，將歸未歸之時，心悲正在于此，該一篇之意。(二章)

鶴鳴婦嘆，何相關妙妙。此等語，惟漢魏樂府中間能有之。(三章)

看看句子旁邊所附的短評，〈卷耳〉的「不盈頃筐」句，有「虛象實境」；「我馬玄黃」句，有「奇語」。〈甘棠〉的「勿翦勿拜」句，有「字法」；〈何彼穠矣〉的「華如桃李」句，有「句法」。

這些不過是一部份的例子，但概括來說，他的評詩法和《詩歸》並沒有不同。這《詩經鍾評》，把《詩經》的詩，和一般古詩、樂府，甚至是唐、宋詩相同看待。這對於經典的態度可說是大膽的，也因此引起世人的議論。先前所舉的萬時華《詩經偶箋》的提要，批評說：「蓋鍾惺、譚元春詩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極，乃至以其法解經」，是與這有關。

但《詩經鍾評》的手法，在清初有確實的承繼者。那就是姚際恆。^④姚際恆在《詩經通論》中施圈點、加評語，姚氏明言那是沿襲竟陵派的作法，下面是他的說明：

^④ 關於姚際恆和圈評的關係，筆者以前的〈姚際恆論〉（《目加田誠博士古稀紀念論集》）所收，昭和四九年）有談到。

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類月峰、竟陵之見乎？曰，非也。予亦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學者于此可以思過半矣。且詩之爲用與天地而無窮，三百篇固始祖也，苟能別出心眼，無妨標舉，忍使千古佳文遂爾埋沒乎！爰是歎賞感激，不能自己；加以圈評，抑亦好學深思之一助爾。（《詩經論旨》）

姚氏仍然有竟陵派批判的習氣，在《詩經通論》加圈評，可說是竟陵派的支流，提倡它是可以做爲究明詩旨的有效的幫助。姚氏的評語大多是短評，在句法和章法的妙處插入簡要之語。

還有，姚際恆的《好古堂書目》著錄《批評詩經》（明鍾惺評）五本。

姚際恆的《詩經》解釋，影響到清末的方玉潤，是無庸再說的。方氏也在《詩經原始》卷首凡例涉及圈評，有如下的說法：

古經何待圈評？月峰、竟陵久已貽譏於世，然而奇文共欣賞，書生結習，固所難免，即古人精神，亦非藉此不能出也。故不惜竭盡心力，悉爲標出。既加眉評，復著旁批，更用圈點，以清眉目。豈飾觀乎？亦用以振讀者之精神，使與古人之精神合而爲一焉耳。

方氏這裡所說，可以看出與姚氏、鍾氏所說的相通。

現在有一人，在鍾氏以後的《詩經》學史上，和鍾氏所說相關的是崔述。當然，崔述不是竟陵派學者，他的著述也不用圈評，但是在《讀風偶識》卷一有如下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註，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版。余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書，乃取此冊，攜回空屋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

崔述讓我們注意到玩味《詩經》的趣味性，他以明戴君恩的書作爲《詩經》研究的

出發點，那詩解的立場從上面崔述的記述，也知道是屬於竟陵派的^⑤。《提要》有關於這書的記載：

是書取《詩經·國風》加以評語，(中略)纖巧佻仄，已漸開竟陵之門，其於經義，固了不相關也。

這樣，崔述《詩經》學的一端，是依鍾惺之流的詩解所開闢的路徑，是可以指出來的吧！

——原載《詩經研究》第六號（一九八一年六月），頁一～七。

譯者按：本文所引用林德謀著《古今議論參》、日本伊藤東涯著《經學文衡》二書，台灣皆未見收藏。因委託東京大東文化大學大學院生江淑美學棣至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覆查原文，特誌謝忱。

^⑤ 崔述和《讀風臆評》的關係，〈崔述的詩經學——讀風偶識的立場〉（《詩經研究》第四號所收）有指出。